刘备摊子里的圈子

中国历史上的四大著名圈子：一是羊角哀和左伯桃二人生死结义，二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三是梁山108将聚义，四是秦琼与单雄信患难结义。桃园三结义像无血缘关系的家庭，也像个合伙企业，半私半公，半民半官，公私兼顾，组织严密，管理有序，成效显著，堪称合伙经营的典范。刘备蜀汉集团由三人小圈子发展壮大，圈子现象无处不在，自始至终。

从桃园三结义的契约成立之日起，刘关张在人际关系上结成圈子，在管理上组成班子，在利益上凑成合伙制摊子。为了发展自己，刘备小圈子奔走于袁绍、曹操和刘氏宗亲等圈子之间，在各类圈子里找靠山，占位置，寻找机遇和资源。曹操看重刘关张的实力，想整体招安，刘备一分配合，两分应付，七分发展自己，利用曹操圈子的资源经营自己的小圈子。曹操看重关羽的才能，想用帽子、银子、女子、位子挖走关羽，关羽死活不上道。赵云本来不在三人圈子，他办事谨细，逐渐获得三人帮信任，先进圈子，后进班子，长坂坡冒死救幼主刘禅有功，最终进了刘备的核心圈子，三人帮扩大为四人帮。三顾茅庐活动后，诸葛亮经招聘入了刘备的摊子，进了领导班子，但人际关系与三人圈子和四人帮有本质区别。诸葛亮、庞统、徐庶等招聘来的专业人士在外人看来是骨干，是圈内人，在核心圈子人物的心里，他们在摊子，在班子，不在圈子，永远是大圈子的栋梁、中圈子的骨干，又是小圈子骨干关羽张飞团结、利用、合作、竞争和防范的对象。徐庶在刘备阵营时是圈内人，被曹操强行招聘后，既脱离老圈子，也进不了新圈子，只好保持沉默，一言不发，成为曹营里最孤独的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圈子里边圈套圈。在刘备的大圈子里，以诸葛亮为首的文臣与以关羽为首的武将因来历、专业、情趣、志向、习性不同而不同。文臣好安静，偏好舞文弄墨，武将爱热闹，偏好打闹娱乐。文臣与武将“八小时之内”在一个工作圈子里走动，“八小时之外”各自在不同的生活圈活动。在武将中，因职务待遇不同，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五虎上将”圈子与其他圈子不同。魏延属于圈内边缘人物，他仅仅是个挂名的班子成员。他是三人帮创业中途招安来的骨干，加之有炒原老板鱿鱼，主动跳槽纪录，刘备圈子对他的政策是限制、利用、改造、防范。魏延与持有“原始股”的关羽张飞的分量不同，与高薪招聘来的诸葛亮的政治待遇不同，与经过生死考验的赵云的信任程度不同。享受侯级生活待遇的魏延可以与诸葛亮、关羽、张飞等资深侯级干部有公务和礼节性往来，核心圈子里的人不会真心待他。魏延智商高，情商低，自视甚高，居功自傲，不精通高层政治生活潜规则，经常干犯忌讳的事。诸葛亮隐形圈子对魏延十分排斥，善于自我保护的中下层人员只会表面上应付他，不会与他走得太近。魏延不懂人情世故，不会结党营私，他是大圈子里最孤立、最尴尬、最危险的人。魏延误以为马岱是自己圈内人，殊不知他是诸葛亮圈子悄悄埋下的钉子。

诸葛亮在刘备的圈子里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给自己留足余地，进退自如。离开隆中时，诸葛亮当着刘关张三人帮的面吩咐弟弟经营好家业，将来要告老还乡，这等于委婉地告诉了三人帮，自己将来功成身退，既没有持股掌权的野心，也没有参与分红的欲望。进入刘备集团后，从表面上看，他紧密团结在刘备周围，不加入任何圈子，一对一与大家和睦相处，始终没有卷入任何帮派圈子。在日常运作中，诸葛亮只有工作圈子，没有私人圈子，有部下、亲信、弟子、朋友和“粉丝”，没有兄弟团伙，没有地下帮会，对刘备圈子没有任何威胁。实际上，诸葛亮通过思想、谋略、权力、实战、道德、文章、恩惠、感情和人缘综合发挥作用，无形中把军队办成了学校，把幕府办成学府，在把“五虎上将”等同辈骨干调教成弟子、相处成朋友的基础上，先后把姜维、杨仪、马良、马岱、马谡、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一大批年轻部下训练成学生，他的思想深入人心，人脉遍及朝野，影响力无所不在，他的光环和工作关系网就是一个无形的圈子。

刘备是刘家圈子的老大，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只要他在，别人都是跑腿的，都要圈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大家只能按座次获得收益。刘备白帝城托孤，遗诏把摊子交给诸葛亮，诸葛亮依法依道德推辞。刘禅依法接管了刘备的摊子，但是，他一无实力，二无班子，三无圈子，收拾不了摊子，只好听任诸葛亮说了算，诸葛亮无形的圈子替代了刘备有形的圈子。世上没有不散的圈子。诸葛亮一死，他的圈子化作历史天空上的一缕过眼烟云。

摘自《杂文月刊》

日本考古界的“神之手”丑闻

20世纪日本考古学界最大的丑闻莫过于藤村新一的“神之手”造假事件。这位半路出家的考古业余爱好者，总是如有神助般出手不凡，在他之前，学界争论了近20年日本究竟有无旧石器前期历史的问题，他通过挖掘出大量的文物而轻易解决了。不但如此，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每年都能获得重大考古进展，几乎每次都将日本的历史往前推进了10万年。踌躇满志的藤村甚至宣言，他终将挖出“100万年前”的旧石器。

日本这个超级经济大国出土了比中国北京周口店猿人还要早的文物遗存！这个岛国沸腾了。还来不及细心验证，这些“重大发现”便被编进了日本的中小学教科书，而藤村新一本人，参与挖掘的184处遗迹，几乎处处都能获得重大成果，他被媒体吹捧渲染成了“神之手”。

生活常常教育我们，如果一件事看上去好得不像是真的，那它多半就不是真的。当藤村新一的神话泡泡越吹越大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质疑的声音，最明显的一个疑问是：所有这些遗址，只要藤村不在场，就会一无所获。

学界自不必说，连起初对藤村奉若神明的媒体也开始起了疑心。2000年10月22日的清晨，出土藤村新一考古“作品”最多的“上高森遗址”上出现了一个身着米黄色风衣的身影，他将随身携带的物品分成多处埋藏在挖掘坑内，然后离开了。27日，在50多名记者注视下，藤村新一当众挖出了这些石器，称它们“距今大约70万年”。11月4日，《每日新闻》的专题采访小组请藤村看了22日偷拍下来的他本人在挖掘坑掩埋的录像，藤村像瘫痪了一样沉默不语。当记者追问他对此有何感想，他只答了句“一言难尽”。

由此，藤村的造假真相如多米诺骨牌般一泻千里，为调查此事成立的专门委员会最后确认，经藤村参与挖掘的162处遗迹，有159处纯属捏造。而此事带来的巨大影响也可谓无远不及：考古界与学术界所面对的巨大震惊与羞辱不说，各级学校也忙着修改课本，藤村“发现”遗迹最多的上高森已成支柱产业的“野人经济”也面临破产……

摘自《莫愁》

冯玉祥、张作霖看准段祺瑞的弱点，知道此“戏”定能达到预期目的，再说，表表高姿态，就能赚取声誉，不仅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树立了好名声。

以退为进赚名声

北洋暑期拥有军事优势的冯玉祥与张作霖，共同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随后，冯玉祥与张作霖不约而同地合演一幕辞职的喜剧。

1924年冬，冯玉祥突然通电全国，辞职出洋。人们不禁咄咄称奇，刚刚冒险起兵推翻直系政府，现在功成名就，为何提出辞职？

不管众人怎么想，冯玉祥表现出“坚决”的辞意，他亲自拜访对手张作霖，竭力解释辞职之决心。张作霖装作关切的样子，极力挽留。冯玉祥说：“大帅功高盖世，经验丰富，区区小事，凭你的能力，完全能够处理好，何用劳我呢？况且，我的辞职能为你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应付眼前局势更能得心应手。大帅不必劝阻我，你的好意我领了。”

一向处事慎重的张作霖，仔细琢磨冯玉祥的意图，百思不得其解。

他把冯玉祥的来访告诉段祺瑞。11月26日，段祺瑞又派人挽留冯玉祥，只见其官署一片“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景象，陆军检阅使署已经停止办公，冯玉祥到西山休养。

张作霖更加奇怪，闯荡半辈子，还没有碰到这样一位“急流勇退”的对手。他与手下人商议几天，作出一个惊人之举。2月2日，他从北京赶回天津把开进北京的奉军全部撤走，宣称关内的奉军也将全部撤回关外。他通电全国：“此次政府人选，不参加奉籍一员；都门首府，不驻奉省一兵。业经通令将镇威军名义及战斗组织一并取消，沿（津浦）线驻兵准备分批撤回原防。”12月5日，他又通电全国，自行解除东三省巡阅使一职，并向段祺瑞建议裁撤巡阅使官职，各省可暂留军事长官一人办理军事善后事宜。在行动上，他比冯玉祥表现得似乎更有诚意。

冯、张两人的辞职，局外人看得扑朔迷离，找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12月10日，段祺瑞下令批准张作霖辞去东三省巡阅使的职务，派张作霖、张作相、吴俊升分别担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军务督办，三省军事仍归镇威上将军张作霖节制，各省巡阅使一律裁撤。事实上，张作霖仍是东三省巡阅使。至于冯玉祥，1925年1月3日，段祺瑞令其专任西北边防督办，撤销陆军检阅使一职，并派冯玉祥的部下李鸣钟为绥远都统，宋哲元代理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的另一大将张之江，出任察哈尔都统。这样，冯玉祥的西北边防督办，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

1月7日，为了与冯玉祥的西北边防督办对称，段祺瑞委任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冯、奉两系的势力范围也划分清楚了：津浦线为奉系的发展方向，京汉线为冯系的发展方向。原来两人想要而又不给的，经过一“退”，全部得到解决。

冯玉祥、张作霖看准段祺瑞的弱点，知道此“戏”定能达到预期目的，再说，表表高姿态，就能赚取声誉，不仅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树立了好名声。

摘自《局道》

吴襄提出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费。100万两在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要命的数字，他几乎没有犹豫就放弃了这唯一希望。城破之时，他的宫内搜出的白银却多达3700多万两，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

崇祯帝勤俭误国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然而，这条古往今来几乎铁定不移的定律，对于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来说却是个例外。

崇祯帝朱由检（1610-1644），庙号思宗，在位17年。继位时，年仅17岁。面对他父兄留下的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崇祯帝顾思振作。“每逢经筵，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经常召对廷臣，探求治国方策。他总是鸡鸣就起床，深夜都不睡觉，往往焦劳成疾，他节约自律，不近女色，宫里从来没有宴乐之事。”

崇祯帝自幼养成俭朴的习惯。他初习字时坚持用仿影的方式练，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某日听讲官给他讲书时，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留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把它塞进去遮掩。一个讲官看到了，便奏道：“衣之敝虽过于位，然美德也，何必讳？”

尽管身为帝王，他无法随意出入于民间，但为了节约起见，他却常派人到宫外去从民间采买物品，然后仔细地询问价格。

如此克勤克俭、励精图治、严于律懒惰的皇帝应该说世所罕见，即便流芳百世的几个明君也不过如此。然而问题可能恰恰出在这里。

崇祯严于自律，却又刚愎自用，更兼求治心切，事必躬亲，往往越俎代庖，用人上不能尽其才，朝令夕改，旋用旋黜。总共17年间，他任用过50位内阁大学士，这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记录。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长更换也同样频繁。结果换来换去，竟没有换出一个让崇祯满意的官员来。他曾咬牙切齿地表示：“文臣个个可杀”。

朝臣动辄得咎，无所适从，整个官僚队伍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每当崇祯帝有大事相商时，就会出现这样的回答：“臣愚昧无知，不敢欺瞒陛下，军国大计，您自己看着办吧！”而当危急紧迫时，他亲自敲钟召集御前会议，大臣已无一人出现。尤其可悲的是，当太子奉命出城突围时，因找不到守门军官，四个城门竟无一门能开。这个肩负天下安危于一身的孤独的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开支，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他算了算：此举每年可节省30万两银子，大约能够维持皇宫一个月的支出。可令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裁撤的结果是导致大批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其中就有一个后来领导天下将他逼死的李自成。

1644年，北京城岌岌可危，崇祯紧急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调吴三桂军队紧急入卫北京，吴襄提出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费。100万两在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要命的数字，他几乎没有犹豫就放弃了这唯一希望。城破之时，他的宫内搜出的白银却多达3700多万两，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为了节省100万两丢掉了3700万，乃至整个无法估价的万里江山，这本是一笔再简单不过的账，但崇祯皇帝却到死也没有算清楚。

勤俭，本来是非常好的政治品德，然而到了这样的皇帝手里，竟不幸变成了祸根。

摘自《杂文报》

丝瓜有了思想

季羡林

今年春天，孩子们在房前空地上，斩草挖土，开辟出来了一个一丈见方的小花园。周围用竹竿扎了一个篱笆，移来了一棵玉兰花树，栽上了几株月季花，又在竹篱下面随意种上了几棵扁豆和两棵丝瓜。土壤并不肥沃，虽然也铺上了一层河泥，但估计不会起很大的作用，大家不过是玩玩而已。

过了不久，丝瓜竟然长了出来，而且日益茁壮、长大。这当然增加了我们的兴趣。但是我们也并没有过高的期望。我自己每天早晨工作疲倦了，常到屋旁的小土山上走一走，站一站，看看墙外马路上的车水马龙和亚运会招展的彩旗，顾而乐之，只不过顺便看一看丝瓜罢了。

丝瓜是普通的植物，我也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神奇之处。可是忽然有一天，我发现丝瓜秧爬出了篱笆，爬上了楼墙。以后，每天看丝瓜，总比前一天向楼上爬了一大段，最后竟从一楼爬上了二楼，又从二楼爬上了三楼。说它每天长出半尺，决非夸大之词。丝瓜的秧不过像细绳一般粗，如不注意，连它的根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细的一根秧竟能在一夜之间输送这样多的水分和养料，供应前方，使得上面的叶子长得又肥又绿，爬在灰白色的墙上，一片浓绿，给土墙增添了无量活力与生机。

这当然让我感到很惊奇，我的兴趣随之大大地提高。每天早晨看丝瓜成了我的主要任务，爬小山反而成为次要的了。我往往注视着细细的瓜秧和浓绿的瓜叶，陷入沉思，想得很远，很远……

又过了几天，丝瓜开出了黄花。再过几天，有的黄花就变成了小小的绿色的瓜。瓜越长越长，越长越大，重量当然也越来越增加，最初长出的那一个小瓜竟把瓜秧坠下来了一点，直挺挺地悬垂在空中，随风摇摆。我真是替它担心，生怕它经不住这一份重量，会整个地从楼上坠了下来落到地上。

然而不久就证明了，我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最初长出来的瓜不再长大，仿佛得到命令停止了生长。在上面，在三楼一位102岁的老太太的窗外窗台上，却长出来了两个瓜。这两个瓜后来居上，发疯似的猛长，不久就长成了小孩胳膊一般粗了。这两个瓜加起来恐怕有五六斤重，那一根细秧怎么能承担得住呢？我又担心起来。没过几天，事实又证明了我是杞人忧天。两个瓜不知从什么时候忽然弯了起来，把躯体放在老太太的窗台上，从下面看上去，活像两个粗大弯曲的绿色牛角。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我忽然又发现，在两个大瓜的下面，在二三楼之间，在一根细秧的顶端，又长出来了一个瓜，垂直地悬在那里。我又犯了担心病：这个瓜上面够不到窗台，下面也是空空的；总有一天，它越长越大，会把上面的两个大瓜也坠了下来，一起坠到地上，落叶归根，同它的根部聚合在一起。

然而今天早晨，我却看到了奇迹。同往日一样，我习惯地抬头看瓜：下面最小的那一个早已停止生长，孤零零地悬在空中，似乎一点分量都没有；上面老太太窗台上那两个大的，似乎长得更大了，威武雄壮地压在窗台上；中间的那一个却不见了。我看看地上，没有看到掉下来的瓜。等我倒退几步抬头再看时，却看到那一个我认为失踪了的瓜，平着身子躺在抗震加固时筑上的紧靠楼墙凸出的一个台子上。这真让我大吃一惊。这样一个原来垂直悬在空中的瓜怎么忽然平身躺在那里了呢？这个凸出的台子无论是从上面还是从下面都是无法上去的，决不会有人把丝瓜摆平的。

我百思不得其解，徘徊在丝瓜下面，像达摩老祖一样，面壁参禅。我仿佛觉得这棵丝瓜有了思想，它能考虑问题，而且还有行动；它能让无法承担重量的瓜停止生长；它能给处在有利地形的大瓜找到承担重量的地方，给这样的瓜特殊待遇，让它们疯狂地长；它能让悬垂的瓜平身躺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我上面谈到的现象。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丝瓜用什么来思想呢？丝瓜靠什么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呢？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从来也没有人说过，丝瓜会有思想。我左考虑，右考虑，越考虑越糊涂。我无法同丝瓜对话，这是一个沉默的奇迹。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绳子，绿叶上照旧浓翠扑人眉宇。我站在丝瓜下面，陷入梦幻。而丝瓜则似乎心中有数，无言静观，它怡然泰然悠然坦然，仿佛含笑面对秋阳。

摘自《赤峰日报》

公寓生活记趣

张爱玲

常常觉得不可解，街道上的喧声，六楼上听得分外清楚，仿佛就在耳根底下，正如一个人年纪越高，距离童年渐渐远了，小时的琐屑的回忆反而渐渐亲切明晰起来。

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

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交通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

我们的公寓和电车厂邻，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吧？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车里的灯点得雪亮。专做下班的售票员的生意的小贩们曼声兜售着面包。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

这里的小贩所卖的吃食没有多少典雅的名色。无论如何，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噔噔奔下六层楼梯，跟踪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似乎总有点可笑。

我们的开电梯的是个人物，知书达理，有涵养，对于公寓里每一家的起居他都是一本清账。他不赞成他儿子去做电车售票员——嫌那职业不很上等。再热的天，任凭人家将铃摇得震天响，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溜儿平的纺绸小褂，方肯出现。他拒绝替不修边幅的客人开电梯。他的思想也许缙绅气太重，然而他究竟是个有思想的人。

可是他离了自己那间小屋，就踏进了电梯的小屋——只怕这一辈子是跑不出这两间小屋了。

恐怕只有女人能够充分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优点：佣人问题不那么严重。生活程度这么高，即使雇得起人，也得准备着受气。在公寓里“居家过日子”是比较简单的事。

找个清洁公司每隔两星期来大扫除一下。也就用不着打杂的了。没有佣人，也是人生一快。抛开一切平等的原则不讲，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个还没吃过饭的人立在一边眼睁睁望着，等着为你添饭，虽不至于使人食不下咽，多少有些讨厌。许多身边杂事自有它们的愉快性质。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看也好——那么复杂的：新绿的豌豆，熟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其实又何必“联想”呢？篾篓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够了么？

有时候也感到没有佣人的苦处。米缸里出虫，所以掺了些胡椒在米里——据说米虫不大喜欢那刺激性的气味，淘米之前先得把胡椒拣出来。我捏了一只肥白的肉虫的头当做胡椒，发现了这错误之后，不禁大叫起来，丢下饭锅便走。在香港遇见了蛇，也不过如此罢了。

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然而一年一度，日常生活的秘密总得公布一下。夏天家家户户都大敞着门，搬一把藤椅坐在风口里。这边的人在打电话，对过一家的仆欧一面熨衣裳，一面便将电话上的对白译成了德文说给他的小主人听。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地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的授受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屋顶花园里常常有孩子们溜冰，兴致高的时候，从早到晚在我们头上咕滋咕滋挫过来又挫过去，像瓷器的摩擦，又像睡熟的人在那里磨牙，听得我们一粒粒牙齿在牙龈里发酸如同青石榴的子，剔一剔便会掉下来。隔壁一个异国绅士声势汹汹上楼去干涉。他的太太提醒他道，“人家不懂你的话，去也是白去。”他执拳擅袖道：“不要紧，我会使他们懂得的！”隔了几分钟他偃旗息鼓嗒然下来了。上面的孩子年纪都不小了，而且是女性，而且是美丽的。

谈到公德心，我们也不见得比人强。阳台上的灰尘我们直截了当地扫到楼下的阳台上去。“啊，人家栏杆上晾着地毯呢——怪不过意的，等他们把地毯收了进去再扫吧！”一念之慈，顶上生出了灿烂圆光。这就是我们的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

摘自《视野》

色不迷人人自迷

张至璋

他连续注意她三天了。

总在那个角落，总在那里捧书，总是那么宁静安详，就像教堂内的圣母像。虽然图书馆是个该凝神静气的场所，然而，最深深吸引他的，还是她那三天来一成不变的色调的神秘感。

她永远穿着绿色衣服，鞋子、皮包甚至蝴蝶结也是绿色的。

对他这位青年画家来说，色彩从未让他如此着迷过，特别是绿色。多年来，他的创作一直偏爱黄色、橘色、红色、米黄这类暖色系列，就跟他崇拜的梵谷一般，热情奔放的艺术家本性一样。至于蓝色、绿色、灰色这种冷色系列，几乎从不在他的调色盘上出现过，他认为冷色系列冷酷无情，无法使人动心。

可是现在，才三天，他却发现原来绿色也能调和出这么美丽的世界。她是多么善于选择适合自己的色彩啊，她的绿与她的静，糅合得就像一幅最有自然美的图画。

——老天！

——还亏我自夸是艺术家呢！

她站起了身，捧着书本，悄悄离去，突然使他有所醒悟：

——我怎么没把握机会？光是在这儿傻看。

他提早离开图书馆，一家家服装店走下去。

回到家后，他迫不及待地装扮自己，水绿色的丝衬衫、深绿色的领带、墨绿色休闲裤装。当然，帽子不是绿的，他斜戴上那顶有个小绿鬏的灰呢法国软帽，站在镜前浏览，脑海中浮现出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池塘绿色来。

第二天一早，他穿戴整齐，在绿衬衫领子上，喷了点刮胡香水。图书馆一开门，他首先进入，占住了她三天以来角落上的座椅，摊开书，开始期盼。

——但愿圣母保佑她还会来。

她终于推门进来，那捧书、那种静、那神秘的绿。

她习惯性地走到这角落，看到有人，正要换座，他立即勇敢地站起身，呈现于她面前说：

“大概我占了你的座位，是不是？”

她终于看到他的一身打扮，略感吃惊，随即轻声说：“你也喜欢红色？”

“红色？”

她脸颊升起一丝红晕，迟迟说：

“抱歉，一定又弄错了，我是重度红绿色盲。”

——老天！

摘自《台湾文学选刊》

友谊

贾平凹

画面上站着的是我，坐着的是邢庆仁。邢庆仁是一位画家。我们曾一起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办过书画展，展名叫《长安男人》，实在是长安城里两个最丑陋的男人。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有各自的不幸，其实人的长相也是这样，美人差不多一个模式，丑人之间的丑的距离却大了，我俩就是证据。和邢庆仁来往频繁始于二十世纪之末，到现在差不多已四年。四年里几乎每礼拜见一次，我还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大的毛病，友谊日渐坚刚。我想了想，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我们都是乏于交际，忠厚老实，在这个太热闹的社会里都一直孤独吧。再是，我也总结了，做朋友一定得依着性情，而不是别的目的，待朋友就多理解朋友，体谅朋友，帮助朋友，不要成为朋友的拖累。中国十多亿人，我也活了近五十年，平日交往的也就是七八个人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且随着时间不断地在变换，始终下来的才是朋友。那些在阶级斗争年月里学会了给他人掘坑的人，那些太精明聪明的人，那些最能借势的人，我是应付不了，吃些亏后，就肃然自远了。人的生活就是扒吃扒喝和在人群里扒着友谊的过程，所以，我画下了这幅画。这样的画我同时画了两幅，一幅庆仁索要了去，一幅就挂在我的书屋。庆仁那天取画的时候，说他读了一本书，书上有这样一句话：穷人容易残忍，富人常常温柔。“这话当然不仅指经济上的穷与富，”他说，“你想想，事业上，精神上，何尝不是这样呢？”我想了想，就笑了。

摘自《画人记》